



浦东党建·文化实践篇

文化的力量

上海浦东新区塘桥街道文化立社区实证研究

潘伟杰 孙锐 宋永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浦东党建·文化实践篇

文化的力量

上海浦东新区塘桥街道文化立社区实证研究

潘伟杰 孙 锐 宋永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的力量:上海浦东新区塘桥街道文化立社区
实证研究/潘伟杰,孙锐,宋永华著.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7-208-06782-0

I. 文… II. ①潘…②孙…③宋… III. 社区-
文化工作-研究-上海市 IV. 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5912 号

责任编辑 杨承纮 刘林心

封面装帧 傅惟本

文化的力量

——上海浦东新区塘桥街道文化立社区实证研究

潘伟杰 孙 锐 宋永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50,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6782-0/D·1181

定价 20.00 元

C O N T E N T S

导 论	001
第一章 发现力量	015
第一节 转型:一种分化的社会挑战	017
一、社会结构转型的趋势与执政资源的侵蚀	019
二、社会生活变化的格局与执政方式的挑战	024
三、社区文化活力的出现与执政基础的巩固	026
第二节 创新:一种温馨的治理模式	030
一、选择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	032
二、营造基层党建的价值共识	037
讨论 文化自觉与社会和谐	041
第二章 赢得力量	044
第一节 文化立社区:执政资源的获得	046
一、社区文化与社区党建:支持还是瓦解	047
二、谁有文化跟谁走	054
第二节 尊重文化:执政方式的变革	063
一、社会发展与多元文化:共生还是冲突	065
二、社会和谐与价值共识:尊重还是漠视	070
第三节 营造共识:执政基础的巩固	076
一、多元文化与价值共识:获得价值共识的营造 机制	079
二、文化活力与价值取向:巩固和谐社会的	

文化的力量

—上海浦东新区塘桥街道文化立社区实证研究

执政基础 087

讨论 多元文化的活力与价值共识的意义 091

第三章 积聚力量 095

第一节 建载体:在凝聚中实现融合 095

一、社区书院:一种崭新的尝试 096

二、阳光驿站:在凝聚中实现基层党建理念 101

第二节 育团队: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 108

一、多元化的社区团队组织 109

二、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培育:提升党对基层社会的
治理能力 115

第三节 搞活动:社区生活的活力展现 119

一、文化活动:把激情与活力赋予社区生活 119

二、挖掘文化的层次:让所有的社区成员有
归宿 123

讨论 凝聚与融合:社区文化力量的展现 130

第四章 提升力量 134

第一节 公共参与:社区文化的整合机制 135

一、社区艺术节:社区文化整合力量的提升 137

二、社区读书会:社区文化组织功能的展示 142

第二节 构建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 148

一、社区学校:塘桥学习型社区的成长 149

二、社区报:塘桥社区文化服务体系的成熟 154

三、图书馆:塘桥社区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 158

目 录

讨论 参与和服务:创造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机制	162
-----------------------	-----

第五章 拓展力量 165

第一节 文化空间的拓展 166

- 一、家庭文化:文化立社区的基石 167
- 二、楼组文化:文化整合社区的新机制 173
- 三、文化站:文化整合与利益表达的过程 180

第二节 以文化整合社会:基层党建新的运作逻辑 186

- 一、引导社会:一个故事背后的逻辑 187
- 二、整合社会:文化冲突的消弭 189
- 三、调控社会:关爱每一个社区成员 192

讨论 文化整合社会与现代政党构建和谐社区的行动逻辑	195
---------------------------	-----

第六章 体悟力量 198

第一节 厘清社区的本质 200

- 一、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中国社会新的生长点 201
- 二、文化服务与社区公共精神的形成 207

第二节 提升社区文化的魅力 216

- 一、走向历史:社区文化的积淀 218
- 二、展示现实:社区文化的活力 220

讨论 积淀与发展:社区文化与公共精神	223
--------------------	-----

后记 228

导 论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治理的趋势日益表明,当社区成为城市发展的基本形态时,一个社区的文化在社区各个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社区的文化虽然不能全部都成为正式的规范,但它制约着社区成员的行动,规定着社区成员的观念,提供着社区的秩序。在很多情况下,它甚至要比正式的制度和规范更有力量。更重要的是,文化制约着在中国社会转型大趋势中执政党在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中的能量,因为“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①。文化在社区的兴起,是与中国城市文明的发展以及单位体制的演变联系在一起的,进而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治理模式的变迁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通过对作为一个基层党组织在上海塘桥文化立社区的实践中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完全可以发现文化在社区的兴起,不单单是一个娱乐的过程,事实上,是一理性的社会主体型塑过程,是法律技术转换的过程也是党在现代城市社会的治理策略的转型过程。正是由于采取了“文化”这种治理的模式,才能节省国家的力量和社会的耗费,从而把这些力量运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因此,新的“文化”这种治理策略则通过文化这种迂回而隐蔽的治理瓦解了可能遇到的问题,化解

^①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了可能出现的不满和反对,使得国家统治获得最大可能的支持和合法性,“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①。正是通过对文化及其蕴涵的意义分析,我们才能发现和理解“文化的力量”。

一

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曾经充任中国社会之基本单元的两种形态是村落家族与城市单位。村落家族是乡土文明的载体,单位是城市文明的载体。中国农村的村落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生成的体系,所以我们有时称之为“自然村”,城市单位则是在政治计划力量的主导下形成的一种格局,所以单位具有与这一格局相适应的一种超出其各自社会分工性质之上的共同性质,即单位是中国城市治理结构的基础,并成为整个宏观政治架构的组成部分。^②然而这一格局在中国社会改革日益推进的进程中不断遭到挑战。如果说村落家族文化依然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仍然是理解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视角的话,^③那

①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5 页。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 年第 1 期。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运用国家力量打击村落家族、重构农村基层权威的努力,这一努力对于农村社会的整合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从 1954 年乡政府成立、村委会建立到后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乡村组织变迁的线路,即从服务于经济内在要求(转下页)

么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发展的日益推进,单位及其所维持以单位文化为特色的治理模式却真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①挑战的可能性在于社会资源获得的方式变革,社会成员可以从社会和市场获得资源,党和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和控制方式进入减弱和革新的时期;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不断涌现为个人实现价值和获取资源提供了新的途径,利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强化。^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

(接上页)的适应性变革转变为把农业作为建设工业化的基础和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调控的改造性变革,结果形成动员式的集体主义体制,传统的社会自组织机制被切断了。由于动员式集体主义的最高组织形式——公社,人为地扩大了管理规模,使农业生产所要求的密集型的农业投入得不到保证,增加了组织管理的成本,导致生产组织管理的非经济化。于是,便出现了两重后果,一是血缘关系和村落家族体制被政治重建和动员式集体主义打破了;二是真正能够消解村落家族文化的物质文化的冲击不那么深入,村落家族共同体的潜能依然存在。当承担资源分配职能的生产队这一基本的生产组织单位,因包产到户政策的推行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面临解体的时候,家族文化的复活便获得了其经济基础和制度空隙。行政控制的弱化和有限退出,导致了在许多地区,家族共同体重新构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村落文化再次复苏,其意义及其演变再次得到正视。参阅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3页。

- ①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调控体制的变革,单位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如下重要的变化:单位角色的职能化,企事业单位的政治职能在减弱,专业职能在上升;单位的利益独立化,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利益主体,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单位责任具体化和内向化,企业对企业职工的责任和企业自身发展的责任大大上升,而对政府指令的责任减少。正在从“管理型单位”向“利益型单位”转变。参阅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 ② 2005年,上海非公经济增加值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2.5%,比2000年提高16.5个百分点。

和政府职能的转化促成了单位体制和单位文化的变革,相应地促成了社会调控体制的再造。这一再造过程在作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城市社会调控体系再造的诸多特征日益显露,主要表现为: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带动着社会调控方式的变化。上海把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作为改革的目标,这一战略并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变革,同时它带动了整个社会调控体系的变革。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活动方式,从性质来说,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体制的内在逻辑是不相容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产权制度和政府权力安排。党的十五大决议和 2004 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市场经济体制获得了政治和法律的双重保障,中国社会的改革重点一是如何进一步从政治和法律上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安全保障,使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任务交给社会;二是如何通过公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彻底改变政府发展企业、办社会的角色,真正做到“政与企”分家,“国与社”剥离,把政府建设成为超越于各种社会力量之上的、较为超脱的公共权威和公共品供给者,还政府本来面貌。并在多种所有制结构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秩序和价值理念;三是如何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通过市场机制、政治与法律机制有机地整合在同一政治体系之中,并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使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与其经济地位相应的作用。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将把社会调控体系从政府单向度的统制型关系转变为双向互动型关系,政府的权

力安排和运作机制,既要能够对经济与市场力量对比变化作出灵敏反应,又要能够按照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及时纠正各种经济力量和市场竞争力不良偏好。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带动了社会调控方式的变化,由此导致了单位体制的突破和社区体制的生成。

第二,资源配置方式的更新带动着城市居民生存路径的变化。众所周知,单位在传统体制中是通过依靠对国家的依附获得其资源需求的。这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支配型的资源配置方式所决定的。由于社会资源总量的不足,改革前国家对稀缺资源垄断,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而且包括社会活动空间,即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具体的场所和领域,同时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是单一的。^①当资源由国家来主导配置的条件下,社会成员只有通过依附于国家来确立生存路径了。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入,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社会成员获取资源的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市场的出现。市场的发育和扩展使社会成员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同时社会分工带来的竞争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多元的发展趋势日益显现。社会活动空间的扩展和价值取向的变革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趋势的伴生物。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向来看,将来必然是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逐渐扩展、行政化资源配置方式逐渐缩减。在当今时代,无论是供职于两新组织形式中的人,还是失业者或自由

^① 参阅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职业者,他们并没有单位身份,但是可以凭借国家赋予的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确立其行为的合法性。显然,随着单位外社会体系的日加丰满,个人生存路径的变化导致了单位体制的突破。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如何实现对单位外社会领域的有效调控,就成为中国社会城市调控体系再造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正是基于对单位体制的突破及其社会调控体系的革新的理解,我们自然地建立起本书研究的两个重要关注点:如何发现并有效地建设基层党组织的权力来源以及如何拓展能力建设。因为基层党组织在一个单位体制不断突破的发展趋势下主导社会调控体系的革新,有效地影响、引导新社会调控体系的发育并获得合法性,仅仅借助单位体制内的职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努力地将自身权力进行再生产,以发现新的权力来源,否则基层党组织的生存空间就可能被不断边缘化,从而失去对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权。而正确地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作出回应,有效地突破旧有思维模式的束缚,采取合适的行动策略去发现、提升、拓展基层党组织在社会调控体系构建中的能力,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关键。可以说,浦东塘桥文化立社区的治理模式正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对这一发展趋势的深刻反思和真诚理解。我们也是立足于这一发展趋势来解读浦东塘桥文化立社区所蕴涵的意义。

二

自从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在 1887 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社区”这一概念以来,社区就被人们在学术和实践

领域广泛使用。按照滕尼斯的理论逻辑,社区(community)是基于亲族而结成的社会联合。在这种社会联合中,情感的、自然的意志占优势。个体的或个人的意志被情感的、共同的意志所抑制。与此相应,他认为由人们的契约关系和由“理性的”意志所形成的联合称为“社会”,而社区则是由那些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患难与共,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共同体。可见,社区的关键要义不在于地域和区位结构,而在于人的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因此,社区与行政区划有着明显的不同,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看,发展的主要目标在物质,在地域、环境、经济和设施;而从社区的角度看,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人,在于人的精神、人的满意度,人的归属感,人的凝聚力。”^①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滕尼斯对社区的理解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受到挑战,但是社区所蕴涵的发展目标却对城市社会的再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随着单位体制的突破,一元化的社会调控体系的分解及其功能的转移,通过以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为内容的社区重构城市基层社会的调控体系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此,塘桥文化立社区的选择可以说是切中了单位体制突破后社区所蕴涵的独特意义,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对社区的内在规定性和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的深刻把握。如果说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民主的实施的目的目的是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

①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40 页。

后公共权力从农村中的有限退出所带来的涣散状态的话,那么城市社区文化在公共精神和公共生活领域所显示出来的整合功能就是对单位体制突破之后的一种补救。在依靠单位体制构建的一元化的社会调控体系已经不能应对社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挑战的条件下,文化立社区可以有效地应对和弥补这一挑战和缺陷。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得到证明。

首先,社区文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归属感。归属感决定着社会调控体系的有效性,因此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体现着归属感的强烈,进而制约基层党组织在社会调控体系变迁中的主导能力。从我们对浦东塘桥社区文化建设的调查结果来看,可以发现,社区居民日益增强的社区认同已经否定了西方学者所主张的城市生活环境破坏了社区成员群体内聚力的观点,文化历史积淀的发掘、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的扩展以及文化团队的成熟在不断增强着社区内部的归属感。

其次,社区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和谐的公共活动空间。由于社区是在共同的居住区域中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因此它承担着填补人们在闲暇时间这一独特的功能。随着中国城市居民闲暇时间的扩充,依靠社区缔造一种休闲文化就成为一个日渐突出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不仅仅关系着社区居民的闲暇质量,更重要的是维系着社区居民间的和谐状态。对此,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的展开极大地促进了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度,缓解了居民因市场机制和禀赋差异所带来的冲突。在社区文化这一公共活动空间中,居民在参与和互动中体认公共精神和形成价值共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格尔兹才非常明确地指出:

“文化之所以是公共的,是因为意义是公共的。”^①塘桥的社区艺术节所体现出来的社区文化的整合功能可见一斑。

最后,社区文化服务功能体系的成长降低了公共权力的调控成本,促发了社区公共秩序再生机制的形成。社区文化服务功能体系是与现代社会生活存在密切联系的。在论及现代社会生活时,吉登斯指出,现代社会实际上就是“风险社会”,市场机会主义加剧了现代社会生活的风险。当人之主体以外的力量发展到超越了主体可以自己解决的境况时,人们就不得不把自己的身心交由制度化的社会机构来负责。^②这就是社区文化服务功能体系的成长所依托的背景。社区书院的建设无不体现了对现代社会的风险之缓解的努力。文化以及制度性的文化服务体系彰显了文化对于社区公共精神的形成、公共秩序的塑造、价值共识的达致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对这种意义的文化概念,著名人类学家古迪纳夫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曾作过非常明确的表述:“一个社区的文化是由人们为了以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方式行事而须知和信仰的东西所构成。文化不是一个物质现象。它不是由事物、人、行为和情感所构成,而是它们的组合。文化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事物的形式,是人们洞察、联系以及解释这些事物的方式”。^③从

①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12.

②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313 页。

③ W. H. Goodenough,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Linguistics”, in Report of the Seventh Annual Round Table Meeting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Studies, ed. by P. Garvin,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 167.

塘桥社区文化服务体系中,我们可以体悟出,没有存在于文化之外的人,没有独立于文化之外的人性。文化是人之成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逻辑坐标”^①,当然也是一个社区有别于其他社区的“逻辑坐标”。正是因为这一点,“没有文化模式——意义符号的组织的系统——的指导,人类的行为实际上是不能控制的,只是一些无序的无谓行动和感情爆发,他的经验实际上杂乱无章。作为这些模式的积累总和,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存在的一种装饰,而且是——其特殊性的主要基础——它不可或缺的条件”。文化对社会成员行为的规制和引导随着单位体制的突破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变得越来越重要。

于是文化建设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党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力量,通过文化建设,提升对社会发展的领导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动员能力;通过文化建设,提高对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能力和多元社会利益的协调能力;通过文化建设,规制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凝聚社会共识。文化建设的意义在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其一,基层党组织处于全党组织体系的低端,其所具备的可直接运用的资源更为有限。文化正好克服资源有限性带来的基层党组织所面临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方面的挑战。其二,基层党组织往往不与公权力发生直接联系,在这种情

^① 参阅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况下,上级党组织切入各种社会力量所采取的方法、策略与途径一般不能在基层党组织层面上发挥同等有效的作用。其三,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体制的突破以及社会发展的深入,中国的基层社会(特别是城市基层社会)无论是在观念系统还是在运行逻辑上经历着重大的变化。显然,凭借传统的治理路线无法有效地实现对党员的组织和对社会的整合。^①正是基于这些原因的考量,如何寻求一条基层党组织引领城市基层社会发展的道路,成为党建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2004年7月12日,《解放日报》登载了标题为《谁有文化跟谁走——塘桥社区构建党建工作新载体的启示》的文章,这篇文章对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之分析和文化建设内涵之把握所显示出来的探索性促使我们把研究的焦点锁定在塘桥文化立社区上,由此我们把本项研究成果定名为《文化的力量》。

三

塘桥文化立社区的党建策略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日益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城市社会社区调控体系的重构这一特定的环境中展开的,这种特定的时代图景和特定的空间(社区)环境无疑构成了研究者分析和梳理文化立社区的策略从诞生至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所采取的诸种创新性行

① 参阅李友梅等:《静静的变革——上海浦东嘉兴大厦楼宇党建实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